

孟志东 主编

达斡尔族研究

第四辑

内蒙古达斡尔历史语言文学学会
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民族宗教事务处
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古籍办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古籍办

一九八九年·呼和浩特

22.942
342
1:4

达斡尔族研究

第四辑

孟志东 主 编

内蒙古达斡尔历史语言文学学会
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民族宗教事务处
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古籍办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古籍办

一九八九年·呼和浩特

54093

达斡尔族研究

第四辑

内蒙古托克托县印刷厂印刷

1989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内新图出准字(89)第112号

每册：2.70元

前　　言

一九八七年，我们为了促进达斡尔族研究工作，服务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编印了《达斡尔族研究》第一辑、第二辑，受到了国内外读者的欢迎和好评。

今年，我们出于为研究达斡尔族的学者和各界研究人员提供资料、融汇和总结近几年来达斡尔族研究成果，推动达斡尔族研究事业发展的愿望，编印了《达斡尔族研究》第三辑、第四辑。该两辑是由孟志东同志负责主编的，毅松同志在查找资料方面给予了协助。

《达斡尔族研究》第三辑，专门从国内正式或内部出版的历史书籍中摘编了十七世纪以来外国记述达斡尔族方面的历史资料，其主要部分是摘自俄罗斯（苏联）等国学者编写的史书、考古调查、旅行记等，并收入了在国内正式出版的期刊中发表的日本等国学者的几篇有关达斡尔族研究的文章。十七世纪达斡尔族的社会历史情况，是达斡尔族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国内史籍对其记载目前发掘到的甚少。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本辑以摘抄的形式汇集了国外的研究介绍资料。本辑资料，内容较广，涉及达斡尔族研究的各个学科。有些资料之间虽有相近之点，但其中很多情节和评述也不尽一致，这对我们从不同角度了解和研究当时达斡尔族社会历史的概貌是有裨益的。对于外国作者的有些错误观点和提法，我们相信读者同志们是能够加以分析、辨别的。在摘编过程中，对于原文的某些名词和明显的错处，我们加了必要的注释。

《达斡尔族研究》第四辑，主要汇编了近年来国内社会科学书刊上发表和收入的有关达斡尔族的研究文章，以及提交学会第

四届年会的论文和资料，另有几篇短文转摘自学会主办的《达斡尔人》报。选入本辑的文稿，包括了历史、族源、人物、军事、经济、语言、文学艺术、文化教育、婚姻家庭、风俗习惯诸方面的内容，以及学术评论。选用提交第四届年会的论文和资料时，文字上作了必要的修改。

《达斡尔族研究》第三辑、第四辑，是由我学会同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民族宗教事务处、呼伦贝尔盟古籍整理办公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古籍整理办公室合作编印的。在此，我们谨向给予合作和大力支持的单位和部门表示衷心感谢。请各位读者对于书中的不正确之处给予指正。让我们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共同为达斡尔族研究事业的深入发展作出努力。

内蒙古达斡尔历史语言文学学会

一九八九年十月于呼和浩特

目 录

- 达斡尔族的名称及其来源 欧南·乌珠尔 (1)
- 对达斡尔族两千年变迁史的联想 乐志德 (10)
- 原索伦部部分兵丁驻防呼伦贝尔史迹
..... 莫日根迪 宾 巴 (23)
- 关于达斡尔族和蒙古族祖源关系的探讨 敖兴然 (35)
- 试说巴尔达齐的年龄及相关问题 古清尧 (48)
- 桂古达尔酋长领导的抗俄斗争 阿尔嘎图等 (57)
- 楚勒罕与齐三告状 敖乐奇 (62)
- 达斡尔族内迁与齐齐哈尔、卜魁源流考 孙秀仁 (69)
- 苏联境内达斡尔人情况 蒙 和 (78)
- 祖国北疆开发保卫者的足迹
——读《达斡尔族简史》 穀 松 (81)
- 博穆博果尔与巴尔达齐
——达斡尔族历史人物考评之一 满都尔图 (86)
- 论达斡尔族部落首领博穆博果尔 刘金明 (95)
- 巴尔达奇墓碑的发现和碑文略释 赵 展 吴梦龄 (105)
- 外交使节——孟额德 莫日根迪 (114)
- 建威将军色尔袞 吉 登 (116)
- 荣禄的为人及其二三事
..... 阿·恩克巴图 额尔很巴雅尔 (118)
- 八旗筹办处始末 蒙 和 (122)

回忆莫力达瓦达斡尔起义军

- 阿木尔图口述 郭来迪整理 (131)
奈勒尔图等人的反满抗日地下活动 阿·恩克巴图 晓云 (137)
索伦移民和索伦事件 鄂秀峰 (151)
新疆达斡尔族与三区革命 莫日根迪 (159)
骑兵第四十三团简史 宝音达来 佟拉格 敖永文 (161)

达斡尔人治穷致富之路在哪里

- 对莫旗两个达斡尔族落后和先进典型的调查 德格吉夫 (186)
我对达斡尔族经济发展问题的思考 敖兴然 (193)
浅谈奎力浅电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 巴雅热图 (198)
试述历史上达斡尔族商品经济的发展 穆松 (205)
达斡尔族历史上农业的发展 穆松 (213)
达斡尔族的鹰猎 吴依桑 (222)

达斡尔语与蒙古语异同比较

- 兼谈达斡尔语的系属 巴达荣嘎 (227)
新疆达斡尔语动词时的可能世界 沃彩金 (237)
曲棍球、马球及达斡尔语的 Poolie 莫尔丁·恩和巴图 (248)

味美之中的美味

- 赏析敖拉·昌兴一诗 宜日奇 (251)
达斡尔族民歌的调式与旋律特点 金克日·铁宏 (254)
达斡尔族把舞蹈称为“罕伯”吗 孟志东 (266)
为民族教育事业奋斗一生的人——金耀洲 包德华 德木其格 单宏阁 (268)

- 满文对达斡尔族文化发展所起的作用 巴达荣嘎 (278)

对发展达斡尔民族教育事业的若干思考 范 仆 (283)

达斡尔族的婚姻家庭 莫日根迪 (291)

达斡尔族习俗 孟志东 (300)

试论达斡尔人的膳食构成 阿尔太 (349)

达斡尔族人口 尹 宇 (253)

建国四十年达斡尔族研究成就 耶 松 (363)

达斡尔族的名称及其来源

欧南·乌珠尔

达斡尔族是我国北方的古老民族之一。这个民族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或者文字失传，除了已知的有关她的口头传说、近代历史、风俗习惯和姓氏族称外，没有用本民族文字记载的系统的历史，因而她的早期历史和族源问题一直不清楚。为了探索族源，本民族的前辈，如花灵阿、郭克兴、孟定恭、阿勒坦噶塔、何维忠和钦同普老一代知识分子，都曾作过不少努力，他们涉猎群史，撰写著作，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有的还提供了追溯族源的线索。但是，由于以往的局限性或某些研究者的偏颇，这一问题仍没有弄清楚，她的直接族源至今还有几种说法：一说是唐代黑水国的后裔，一说是成吉思汗时代的塔塔儿的后裔，一说是契丹的后裔。总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我们认为，对一个无文字的民族来讲，他们的口头传说、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姓氏族称等及其沿革，在探索其族源问题的过程中，是不可忽视的参考依据。唯物史观告诉我们，新陈代谢在文化比较落后的民族中的进行是极其缓慢的。越是文化落后或被压抑的民族，就越是顽固地保存他们固有的传统习惯。从而，为这种保守性所遗留下的东西，往往给我们以重要的追本溯源的线索。本文拟试用语言学的观点，利用“达斡尔”这一名称的语言、语义及其沿革所提供的线索，结合文献和传说，对达斡尔的族源加以探讨。

(一)

达斡尔 (Dawur ~ Dagur) 这一名称，在近代汉文历史文献和汉语中，曾有过多种译写和译音形式。比如，用两个字（或音节）表示的“达呼”人、“达户”店等；用三个字（或音节）表示的“达虎儿”、“达呼尔”、“达瑚尔”、“达古尔”、“达虎里”、“大狐狸”、“达古里”、“打鬼力”、“达库力”、“达古鲁”、“达乌里”等等。显然，其中有带侮辱性的称呼，这在旧社会是难免的。那么，为什么会有多种译写和译音形式呢？我认为：

首先，这与“达斡尔”一词的语音特点有关。原来，“达斡尔”的本音是Dagur，按国际音标则为 [Tavur] [Dayur]，其中的辅音g [ɣ] 是舌根浊擦音、是g处在两个元音之间的变体。这在达语音系里是常见的。例如：dagu [dayu] （翻毛皮大衣）、gager [gaver] （长衫），其中的g都是如此。因此，用汉字准确地译写是困难的，也就只能用读音差不多的字，如“呼”、“古”、“库”等来译写。加之汉字同音字多，同时又因人而异，自然会有多种多样的译写形式了。然而，这种情况的存在，更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达斡尔族没有自己的文字记载，族称没有定形写法等所致。同样基于此，“达斡尔”一词就是用满蒙拼音文字译写也有多种。如用满文译写的有“达库尔”、“达呼尔”、“达古尔”；用蒙文译写的有“达古尔”、“达呼尔”等。

其次，在汉语音系里没有颤音r [γ]，并且在其音节结构里，除了只有以n、ng为韵尾的闭音节外，其他辅音从不出现在韵末构成音节。正因为如此，在译写“达斡尔”这样名称时，不但用两个字（或音节），如“达呼”、“达户”，象译写“蒙古勒”为“蒙古”那样，就是用三个字，如“达呼尔”、“达古尔”、“达古鲁”，并且也有用“尔”、“里”、“鲁”等音节来译写其韵尾的γ辅音。

(二)

上述为清代以来对达斡尔名称的译写及其语音分析。那么，明代以前的达斡尔在历史文献中的情形如何，出没出现过“达斡尔”这一名称呢？当然，决不象有些人所说的那样，达斡尔族自投清以后才有自己的名称。事实上，明代以前亦早已有之，只不过是由于少见或被忽视罢了。

早在16世纪后半叶，明万历年间，就曾有珠尔齐特、额里克特、达奇鄂尔三个部落，向蒙古扎萨克图汗图门台吉纳贡的记载①。其中的“达奇鄂尔”就是“达斡尔”的一种译写形式。如 Dak i'er < Dak i' ur < Dakur < Dagur。关于这一点，在江实译注的《蒙古源流》一书里，根据日人和田清的考证，也认为这个部落就是达斡尔②。此即为明代的一种译写形式。

清乾隆年间，在钦定《辽史语解》里，根据八旗姓氏通谱将“大贺”改正为“达呼尔”③。有人怀疑这种改法是否有根据，但我认为是有根据的，而且，其根据相当充分。

证一，我们知道，清起初曾称后金，自认为是金朝的延续。因此，清对于辽金，特别是对金的历史并非一无所知，对凡在东北这块土地上活动过的辽的后人多少是知情的，至少年代比现在近得多。

证二，语音上对应。因为，“大贺”与“达呼”、“达户”对应，而“达呼”、“达户”是“达呼尔”的短尾译写形式，所以“大贺”也就是“达呼尔”在早期汉文中的省略译写形式，如：Dahe < Dahu < Dagur。

证三，在达斡尔原十八个姓里，头一个姓是达呼尔氏。例如：“托尔托保，墨尔根达虎里，以族为氏，隶镶蓝旗，乾隆三十七年，……从征金川，……嘉庆四年补呼伦贝尔总管……”④。这个“达呼尔”氏就是“大贺”氏的全尾译写形式，而“大

“贺”氏也就是“达呼尔”氏的唐代短尾译写形式。对“大贺”的改写，正是操同语系语言的清政府才做到的，所以说那个“改正”二字是有分量的。

证四，根据达斡尔族郭博勒氏中山的家谱得知，不姓达呼尔的人的先祖也是出自大贺氏⑤。这不仅有力地说明了达斡尔与契丹大贺氏的渊源关系，同时还反映了在唐代开元、天宝年间，即公元8世纪前半叶，契丹“阻舞可汗，分三耶律为七，二审密为五，并前八部为二十部”的事实。可见，今天达斡尔族的有些姓氏（部落），可能是直接由那时蕃衍下来的，有些是迁徙到黑龙江以北后起的。

(三)

由上论证，我们已经看到，达斡尔来自契丹说不无道理。那些旁证说明，其根据是相当充分的。下面，再从它的由来和意义上考究。

在语义上，对达斡尔有种种说法，不过有些说法已被批驳或被事实所否定，如“达哈尔尼雅拉玛”、“达库莫依”等说，已不值得再提了。但有些说法还左右着人们的观点，很有必要予以澄清。自清乾隆将“大贺”改正为“达呼尔”以来，“达呼尔”一直是最通用的译写形式。那么，我们的前辈为什么标新立异，将“大贺”改为“达斡尔”呢？其实，我认为满可以不必改，因为这样也还只是语音近似，和“达呼尔”一样，并不能完全代表本音Dagur。然而，阿勒坦噶塔先生为什么改呢？原来，这跟他的主张和假说有关。他说：“考塔斡尔似由达怛转易而来，相通之脉。是以元初之塔塔儿颇有由塔斡尔误书之嫌。……以讹转讹，后世定为塔塔儿。或达呼尔之呼音，于昔书为 Dawar，及后来因音声相近，而变呼为 Dagur 者，也未可知也。由上译音观之，可证达斡尔乃达怛之对音，塔塔儿之遗部也”⑥。

可见，他是由这种假说而改的。这里且不说“怛”、“斡”二字之对音如何，仅就“由……误书之嫌……也未可知也”而得出“……可证……塔塔儿之遗部也”的结论，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至少在逻辑上是说不过去的。

再就是钦同普先生的“Daa or”（故址）^⑦说，也是令人无法遵从的。因为，“故址”或“原住址”等这样的名词或词组，也象“母亲”、“祖国”一样，说它具体，也具体，说它抽象，也抽象。如我们的祖国是中国，我们的故乡是西拉木伦时，是具体的。可是一离开具体所指，就不知所指的是什么了。故以此起名的事，是异常罕见的。正如我离开母亲，又回到母亲的身边，为纪念而起名为“母亲”一样是荒谬的。另外，还有什么来自“达如花赤”（长官）说，则更不足凭信。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客观的意见：“由于达斡尔人另外两个名号得名的事实：诺莫尔人因居住在诺莫尔河沿岸，纳兀人因居住在纳兀（嫩江）江沿岸。启发了我们对于达呼尔名称由来的考虑，也可能是因为居住在塔兀儿（讨语儿）河流域。达斡尔虽然一直作为一族的名称被人称说，直到清代仍有达呼尔氏，见于《清史稿》的尚有托尔托保和博斌两人；达呼尔氏在原十八姓中以首姓的地位占其中之一，其他的姓如鄂嫩氏因鄂嫩河，精奇里氏因精奇里江，也是一些侧面的参考；辽时契丹曾计划用诸部乡里名号作姓氏；金时追记女真旧事，曾以某水的某部，某乡村为区别。”^⑧

再如，“《魏书》记今洮儿河为太鲁水，亦作太添水，又《北史》亦作太岳鲁水。元代记录此河作塔兀儿或托吾儿，其原名为 Tagur 或 Daxur。据金史国语解，Solon 语谓耕种者，曰达胡里（Daxur）。太鲁水（塔兀儿）之名与此同语源也。又与索伦杂居之 Daxur 人，中国人译为达呼尔或打虎儿，是此名称或亦与洮儿水有缘故也。”^⑨

(四)

以上两段论述，对达斡尔名称来源的看法和具体结合塔兀儿(Dagur)河所作的推论，是有根据的，至少比那些任意臆造或猜测性的论断是可靠得多的。并且，这种看法和达斡尔族古老的传说相互呼应。我们还可以引一些事例来证明：

一、一百多年前，我们的老前辈花灵阿先生，根据当时民间传说所说的“松花江南岸，有古城村庄遗迹很多”^⑩，证实了在讨儿河、松花江沿岸，有辽时的达呼城遗址和达户村等古迹的事实。

二、《布特哈志略》所载的歌谣，如：

“边壕古迹兮，吾汗所遗留；

泰州原野兮，吾之养牧场。”^⑪

难道，这不正是传颂他们昔日的生活与活动的地方——泰州的长春边堡和包括大贺、塔古里等在内的契丹二十部放牧之地泰州原野——的诗篇吗？这能说与达斡尔没有关系吗？

三、达斡尔族的一些老年人都可能知道，过去在祭祀祖先时，萨满祷词里有这样的话：

“Xiar murees xoldurj，徙自西拉木伦，
Har murd handsen，奔向哈拉木伦，
.....”

这不正是道出了达斡尔北迁的事实吗？当然，这个“西拉木伦”决不可以理解为被称为结雅河的精奇里江，因为精奇里江是黑龙江的支流；“哈拉木伦”也不应理解为黑河，因为黑河是临潢河的上源支流。二者都在同一地域，谈不到奔徙的问题，故只能理解为由临潢河流域迁徙到黑龙江流域才是正确的。

四、在旧社会，有些达斡尔族家庭里曾供奉“库烈尔”佛，据说这是一位性情暴劣的佛爷。这与辽宋金初，契丹北迁领袖库烈儿公的名字相对应，恐怕这名字的相合也不会是偶然的。如果

有关联，此时不正是达斡尔族的先人因国家崩溃而北迁的时期吗？

五、在三四百年以前，达斡尔族在黑龙江以北时，就已不是纯游牧或狩猎民族，而是具有较高文明程度的农业民族。请看一些事实记载：

“结雅河沿岸住着‘耕地的人’——达斡尔人。……他们不同于俄罗斯所熟悉的那些西伯利亚野蛮人。中国人常常到达斡尔人这里来征收贡物，进行贸易，给他们运来各种货物——绸缎、白银等。由于与中国人经常来往，达斡尔人的文明程度也比较高。哥萨克发现达斡尔人处有修盖得很好的木房，窗上糊着自制的纸张以代替玻璃。从外表看，达斡尔人很象中国人：男人按中国的习惯蓄着辫子，身穿绸缎长袍。他们的生活方式也与北方的游牧民族不同：他们定居在自己乌卢斯（村落），从事农业和畜牧业。村落四周是种满大麦、燕麦、糜子、荞麦、豌豆的田地。他们的菜园作物有大豆、蒜、罂粟、香瓜、西瓜、黄瓜；果类有苹果、梨、胡桃。他们会用大麻榨油。他们饲养的家畜数量很多：有大群的马、牛、羊、猪；他们用牛耕田，就象俄罗斯人用马一样。……到处都可感到中国的文化影响：达斡尔人从中国人那里购买绸缎（丝织物）、布匹、金属”。^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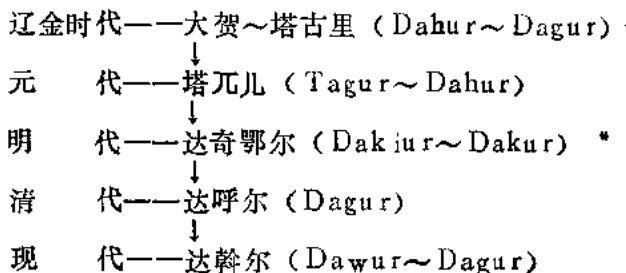
由以上三百年以前达斡尔人的社会生活与经济文化状况不难看出，如果是一个长期过着游牧或狩猎生活的土著民族，决不会有这样的情形。不仅如此，而且在哥萨克人看来，他们还有好几座设防坚固的城池。有的“规模宏大的城堡占地半俄亩，实际上是由城墙连在一起的三座并列的土城。它没有城门，但是从塔楼下面有宽广的地地道通向壕沟，坐骑可通过壕沟。城里有深窑，妇女儿童以及牲畜都藏在里面。环城有两道一俄丈深的壕沟。”^⑬

上述足以说明，他们具有一定的政治军事战略思想和治国经验，是由较发达、开化的地区迁徙过来的民族。这除了在辽末金初陆续北迁的契丹遗部辽国军民之外，还能有哪个民族呢？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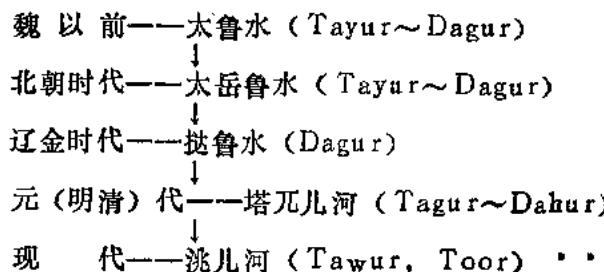
知道，元末明初大变动时，蒙古军民没有后撤到这里，所以，无论如何，不跟契丹挂钩是解释不了的。

总之，我们根据达斡尔名称的语音、语义及其汉译形式所提供的线索，结合历史文献和古老的传说考究与分析的结果，得出如下结论：

一、达斡尔这一名称，是一个古老的名字，而决不是什么清代以来才有的。从她的由来和沿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她基本上保持了原来语音特点，只是在译写形式上不同时期各自不同罢了。从她的今昔和古音的译写形式对比中，我们得出如下的沿革图：



二、对达斡尔这一名称的语义分析和考证，我们知道，她决不是来自什么“达怛”、“故址”、“投降者”、“隶属者”或“官长”等等，而是由原住地的河流名称而来。作为达斡尔名称来源的洮儿河名称的沿革图，也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语音特点，如图：



由此可见，作为达斡尔名称来源的洮儿河名称的沿革，也基

本上一致，彼此是相吻合的。

三、达斡尔名称和与其由来相关的洮儿河的名称沿革规律的基本一致性，充分反映出达斡尔族与契丹族的渊源关系。

注：

①《蒙古源流笺证》，曾植证。尔田朴本，卷6，18A—B。

②傅乐焕：“关于达呼尔的民族成分识别问题”《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一辑，4页。

③《辽金元三史语解》卷3，2B。

④《黑龙江志稿》人物志，卷52，14A—14B。

⑤同上，卷54，39B—40A。

⑥阿勒坦噶塔：《达斡尔蒙古考》，1980年12月内蒙社会科学院复印本，第31页。

⑦钦同普：《达斡尔民族志稿》，1981年3月内蒙社会科学院复印本，第33页。

⑧陈述：“达呼尔族的来源”《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一辑，第118页。

⑨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三年九月版，第50页。

⑩参看陈述：“达呼尔族的来源”《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一辑，105页。

⑪参看《布特哈志略》。

⑫谢·弗·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5页。

⑬同上第21页。

*明代只发现这一译写形式。

*蒙古语读音，Toor～Tuor 和达语的～Dawur～Dagur对应。明清时代的缺具体考查。

(本文原载于《北方民族》，1988年第1期)